

松風秋雨集

栗栖 著

武汉出版社



松风秋雨集

栗 栖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风秋雨集/栗栖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430-4253-7

I. 松… II. 栗…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8535 号

著 者:栗 栖

责任编辑:楚 风

封面设计:天 宇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实习保障工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125 字 数:100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自 序.....	1
安定团结 稳定局势.....	2
致顾大椿同志信.....	17
历史的真实 才是真实的历史.....	20
《析嘶集》后记.....	41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真正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43
《彭戈传》后记.....	53
寄《心潮诗词》工作同仁.....	58
读《南冈诗选》.....	62
总结经验 坚定方向 开拓未来.....	66
《易鹏诗文集》序.....	72
《栗栖诗集》自序.....	74
《栗栖诗集》后记.....	75
发扬抗洪精神 坚持二为方向 做好学会工作...	76
喜读江泽民同志《七绝二首》.....	82

松风秋雨集

祭柳文·····	86
代拟祭张银芝文·····	88
终生留得文章在 寿比南山有过之·····	89
玉碑英烈须永传·····	93
振奋起伟大工人阶级精神·····	102
2000年与《老年文汇报》总编辑的谈话·····	111
祝贺李尔重同志文集出版·····	114
纪念项英同志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118
烈士永生育我后人·····	122
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述传的一封信·····	130
在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代表会上的发言·····	132
我对天汉湖区军民一九四二年反击日寇海陆空军 空前大扫荡的回忆·····	135
庆祝《谢滋群画传》出版发行·····	148
致《心潮诗词》编辑部·····	150
《夕日朝阳集》自序·····	152
让革命精神世代相传·····	153
永远的纪念·····	157

自序

全国解放后，所有文稿均丧失于十年动乱中，已无从收集；其发表于《长江日报》等报刊者，亦因年代久远势难寻出。

兹仅将离休后，中共武汉党史的片断回忆、纪念先烈等文和一些社会活动中的会议发言讲话加以收集什乱成册；实乃松风秋雨身在江湖心存庙堂之情怀所寄，亦以保留真实历史的履痕陈迹而已，是为序。

安定团结 稳定局势

——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三届第十四次
全体（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中央两个会议精神和所作出的各项决定。我认为要真正转上去，最重要的是要真正做到安定团结，稳定局势。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想：

一、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恢复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准则。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这一点我党的教训是深刻的。回顾五八年大跃进，搞什么高指标高征购；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浮夸风，都是违背实事求是的，谁敢说真话，谁就是右倾保守。五九年本来应该纠“左”的，结果又来了个反右倾，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左上加左，头脑发热。政治上不实事求是，经济上也不实事求是，结果搞得没饭吃，饿死

人，这个数字是保密的，至少是以万计的。弄得人心惶惶，城里人往农村跑。毛主席说民心不安，军心也不安。幸亏来了个八字方针，三年调整，七千人大会为原右倾平反，这才回到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上来，人心才比较舒畅，工作才比较符合实际，因而形势迅速好转，局势慢慢稳定下来。谁知六四年刚刚好转，不久“四清”运动又来了，接着六六年又搞起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来，林彪、“四人帮”乘机插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不仅没有实事求是，没有民主集中制了，就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了，干部说批就批，说斗就斗，说关就关，什么“罪该万死”，我心想，你叫我死一次我怕，叫我死一万次我不怕。党的生活也停止了，“文革”指挥一切，这不是把共产党解散了是什么？这经过党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这不是和当年李立三路线搞的什么用行动委员会来代替党中央一样吗？对“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我完全同意邓副主席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确实锻炼了人，教育了人，它使人们懂得了什么是“复辟”，什么是“法西斯专政”，它所造成的损失

确实是无可估量的，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连裤子都快没有穿的了，还谈什么共产主义？党是领导一切的，首先要有党的民主，要有党规、党法、党章，不管官多大，都得遵守，党员的民主权利一律平等。有了民主，才能谈到社会法制，才能谈到群众路线。

二、必须注意在解决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出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个经验是总结了，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违背它。现在揭批“四人帮”有没有这种情况？毛主席说，路线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这个教训，可以说是血的教训，但总是不能接受。十年内战时期，肃反时把许多好同志当AB团杀掉了，最后弄清楚是AB团杀了共产党，许世友还是毛主席把他放的。康生搞的“抢救”运动，把许多好同志打成特务，三五九旅百分之八十都有问题，王震同志提出了意见，幸亏有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才没有死人。“文化大革命”更别提。从“另一种倾向”变成了“另搞一套”，革命的都成了反革命、走资派、叛徒、特务。为什么会造成另一种倾向，应该分析，吸取教训。我看有的是认识问

题；有的是“左”比右好；也有的是先入为主，凭想当然办事；还有的是思想意识不好，品质恶劣，打小报告，想捞一把，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还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坏人整好人（汪心一同志插话：凡是整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我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总的来说比历次运动都是健康的，但有没有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呢？我看也要一分为二地看。

三、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彻底肃清流毒和影响。极“左”是一种思潮，“左”比右好，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解放后，历次运动基本上都是反右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推行极左的政策，达到极右的目的，篡党夺权搞复辟。一九七〇年，林彪自我爆炸，周总理曾提出要批极“左”思潮，说我党多年来没有批“左”，但后来，纪登奎同志说什么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右得无可再右了，于是“四人帮”打着批林的幌子，和王明批立三路线一样，愈搞愈“左”。我们现在解放思想，就要明确极“左”的就是极“左”的，要拨乱反正，说实质是右是指它的目

的，它的归宿，但政策“左”就是“左”，否则，左右不分，把人愈搞愈糊涂。所谓“左”比右好的思想也不可能真正解决。

四、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对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也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做到不留尾巴，不留后遗症，善始善终，从而使这场运动真正成为历次运动的典范。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转是把揭批这个中心转到实现“四化”这个中心上来，遗留问题不注意解决，是转不好的。中央特别强调要善始善终。俗语说，慎其始并善其终者为善策；不慎其始而能善其终者为失策；既不慎其始又不决心善其终者为败策。我认为，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省委对武汉市问题的处理，就是既不慎其始又不善其终者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作为原市委秘书长，我应该把市委当时的情况向省委（扩大）会议作一汇报。而当时我是处于不能说话的地位的。省委对武汉市委究竟是什么看法？是基本上抵制“四人帮”，在斗争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还是一个烂掉的单位？我觉得是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举几条说明：1.

武汉市委始终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是正确的，即使七六年省里开了襄樊会议，逼迫转弯子，压武汉市，说武汉市是“小凉河里的不倒翁”（即走资派），市里在被迫作检讨中，也只按照中央的口径承认了不该叫“滚”的问题，而且坚持按中央七四年解决武汉问题的红七条办事，对襄樊会议是有抵制的。2. 在组织上，为了维护斗批改的成果，市委对于“四人帮”在武汉的黑干将大闹，提出要恢复车间革委会和各级领导小组的复辟要求，都是坚决抵制的。对于这个问题，七四年市委曾专门发了文件，七六年又一再建议韩宁夫同志用省委名义转发市委的这一文件，为下面同志撑了腰，在组织上稳住了阵脚，这是全省干部都知道的。3. 七六年清明节前后，武汉广大群众举行各种活动沉痛悼念周总理。南京、河南都把献花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而武汉市委坚决顶住了帮派骨干分子要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反动要求，保护了革命群众。4. 武汉市委以我这个小小的秘书长主持，始终坚持搞了个动态班子，收集了武汉地区帮派干将的所有重要活动材料，我是担着杀头的风险搞的。在省常委会上，

×××曾当着“造反派”的面讨好说，听说武汉市有个动态班子，搞“造反派”的特务活动。当时搞这些材料连对××都是保密的。那时省里害怕不搞，“四人帮”粉碎后，到北京中央汇报会议上，拿的都是市里的材料。但是却把武汉市当作龙头，不问青红皂白，采取黑李逵进江洲城，抡起宣化大斧排头砍去的方法，把全部书记加秘书长一齐砍掉。华主席在十一大报告中说，领导班子严重不纯的才进行调整。武汉市委领导班子除董明会外究竟哪个属于严重不纯？中央是只进不出，我们是统统“砍头”，南辕北辙，对比之下怎么说？就是有错是哪里来的？这能够服人吗？这公道吗？这叫实事求是，叫从实际出发吗？党的政策能允许这样处理吗？毛主席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有政治经验的人，对一个单位就是烂掉了，也要找点积极因素。而这种做法却把积极因素也打成了消极因素，竟有这种蠢人。省委工作组到武汉市两个月，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话，我们有什么错误，材料也未给我们见面，就这样调动，这叫正常调动？正在清查期间，就这样调走叫正常调动，从何说起？这不是骗小孩

子？我的儿子是华工一个班上的先进党支部的书记，前年十月总结了一个经验材料，学校准备发。后来由于听说调动他老子的工作，总结的材料就不发了，可见连累我儿子也不得了。幸亏李副主席来武汉，把一些老同志找去见面，我也去了，当时在华工工作的邱静山同志见了我，回校才对我儿子说：“我看到你爸爸了，你的材料还是发”，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我还是感谢邱静山同志的。

这样处理武汉市的问题，据说有一条理由是：“粉碎‘四人帮’后斗争不力。”可以回顾事实，“四人帮”完蛋后，是我们先把董明会等人关起来审查的，而那时省里却把朱鸿霞等人弄到省招待所住起来，一天还吃一元二角的伙食，后来还是被工农兵群众抓出来的。十月粉碎“四人帮”不久，群众纷纷起来要抓“四人帮”的黑干将，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省委还急忙发了电话通知，说不能随便抓人，说抓人是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这不是压制群众同“四人帮”做斗争吗？当时市里看到通知后，我说不能发，最后我和田文、王杰、王哲南同志商量起草了一个针

锋相对的通知下达：“查最近有人擅自离开工作岗位，逃避运动，这是不能允许的，应即返回原单位参加运动，否则扣发工资，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这都是有文字可证的。到底是谁斗争不力？说实在的，群众对武汉市委有意见，主要是王克文同志没有很好地作检查。

还有，说调我的工作，其中一大罪名是“两清”材料问题。“两清”材料，是省委作出的决定，说要贯彻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和“造反派”谈判处理，根据王克文同志的意见，我和王哲南同志一起，与“造反派”谈判，双方派代表共同启封的问题。市委的代表已经派好，准备第二天共同启封，可是当天晚上却被“造反派”把材料抢跑了。而工作组王步清同志却追问我：“怎么把材料借走了？”我说不是我借的，是“造反派”抢走的，我把以上情况向他作了如实反映，我说如果说是借的，那我不清楚了，你可以再找机要处长了解。而王步青同志却说：“照你说来，那么机要处长就没有一点组织性吗？是机要处长里通山头吗？”意思很清楚，是我给了“造反派”的。他还威逼我说：“好啊，你说材料是

抢的，不是借的，吴炎金说了，他要抛材料的！”王步清同志想用逼供信来嫁祸于我，给我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身为省委常委、政法办公室主任，在粉碎“四人帮”后还这样搞，真是骇人听闻，有什么党规、党纪和宪法？有什么实事求是？战国策上说“曾参杀人，三人疑之，虽慈母不能信也！”我就是这样，被仅仅根据个别人污蔑不实之词，逼而信之，作出了极不严肃的处理。

省委工作组到了武汉市，开始发动解决王克文同志的问题，这个我们都是拥护的，后来提出要常委整风，我们说应该按照十一大要求先搞清查，可是工作组偏要进行整风。过了几天，忽而又说先写个报告批了再整，可是写了报告几天后又说不批了，开始整吧。常委坐了下来，每人都作了“三大讲”，自我批评。以后又说还要分三步，第一步是请进来，让区、局、部、委、办的领导提意见；第二步是走出去，到各战线“三大讲”听意见；第三步是再走回来，整风作结论。按照这个安排，第一步走完了，一看没有搞出什么问题来，于是就急忙地宣布全部书记、秘书长调动工作。又说风整完了再走，继续走完第二

步、第三步，这不是明明想把我们抛到群众中去围起来整吗？可是有的同志走出去，一讲还受到群众的赞扬，这样第三步也不吭了。我们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武汉市的，这种做法，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吗？是正常的吗？我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未起好作用，主要是王步青同志未起好作用，是给省委戳了乱子的，帮了倒忙的，陈丕显同志是上了当的。为了顾全大局，王步青同志的许多违背实事求是，“左”比右好，搞另一种倾向的事，我就不具体说多少了。现在我还相信工作组的同志心里是明白的，王步青同志本人内心也应该是明白的，被王步青同志“发动”的同志也是明白的，今天根据三中全会精神应该提出来总结经验教训，为了安定团结，稳定局势向前看，我还是愿意和这些同志团结起来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陈丕显同志经过一年的实践，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并表示对武汉市的问题要作出圆满的解决。陈丕显同志的这种考虑，我认为是有利于团结的，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我表示欢迎，感到满意。我还建议，请省委一定要本着善始善终的精神，采取果断措施，对凡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单位，都应